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Ecological Revolution: An Ecological Marxist Perspective

John Bellamy Foster

University of Oregon, US

Translated by MO Yonghua

Xizang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une 15, 2026

Accepted: July 15,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John Bellamy Foster. (2026).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Ecological Revolution: An Ecological Marxist Perspective. MO Yonghua (tran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3), 029–036,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3.00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3.004>

Abstract: Based on John Bellamy Foster’s lecture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Ecological Revolution: An Ecological Marxist Perspectiv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dialectical interrelations among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ecological Marxism, and ec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races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first emerged in Soviet ecological thought in the 1980s and subsequently became a central category in Chinese Marxism. In contrast to Western cultural theorist Jeremy Bentham’s attempt to dissociate China’s concep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from ecological Marxism, Foster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is in fact a historical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Marxism, and that any attempt to separate the two amounts to a denial of the revolutionary implications of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is not merely a topdown policy but a profou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driven by selfmobilisation from both above and below, pointing towards a new form of ecological communism. The paper further emphasises that the no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is inconceivable in any meaningful sense outside a society engaged in building socialism. A genuine ecological revolution must transcend the logic of capitalism itself and incorporate the concept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letariat” as a new agent of change.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Marx’s theory of metabolic rift, together with Engels’s dialectics of nature, provides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ecosocialism and offer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pathwa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Keywords: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Ecological Marxism; Metabolic Rift; Environmental Proletariat; Socialist Ecology

Source: Foster, J. B. (2022).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Ecological Revolution: An Ecological Marxist Perspective. *Monthly Review*, 74(05).

Notes on the translator: MO Yonghua is a lecturer at Xizang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University, whose research focuses on social science translatio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His email is 524254755@qq.com.



生態文明、生態革命： 一種生態馬克思主義視角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文

美國俄勒岡大學

莫永華/譯

西藏農牧大學

摘要：本文以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的演講《生態文明、生態革命：一種生態馬克思主義視角》為文本依據，系統闡釋了生態文明、生態馬克思主義與生態革命間的辯證關係，追溯了生態文明概念的理論淵源與時代意義。文章指出，生態文明概念最早產生於20世紀80年代的蘇聯生態思想，隨後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範疇。針對西方文化理論家傑裏米·倫特試圖將中國的生態文明觀念與生態馬克思主義相切割的觀點，福斯特認為，生態文明概念實際上是生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歷史產物，任何將二者分離的企圖都是對生態變革革命意義的否定。在當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不僅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更是上下聯動、群眾自我動員的深刻社會轉型，指向一種新型生態共產主義。文章進一步強調，脫離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生態文明概念便無法具有真正的意義。真正的生態革命必須超越資本主義本身的邏輯，並吸納『環境無產階級』概念作為新的變革力量。文章最後指出，馬克思的新陳代謝斷裂理論與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共同構成了生態社會主義的科學支撐，為21世紀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重要理論路徑。

關鍵詞：生態文明；生態馬克思主義；新陳代謝斷裂理論；環境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生態學

今天，我想和大家談談生態文明、生態馬克思主義與生態革命之間的聯系，以及這三個概念在辯證地結合在一起時，何以被視為指向21世紀新的革命性實踐。更具體地說，我想提出幾個問題：我們應當如何理解『生態文明』概念的起源及其歷史意義？它與生態馬克思主義的關係是什麼？這一切又如何與旨在超越當前全球性危機、保護·馬克思所稱的『人類世代鏈條』以及廣義上的生命的全球革命鬥爭相聯系^[1]？

2018年，文化理論家傑裏米·倫特(Jeremy Lent)(《模式化本能：人類尋找意義的文化史》一書的作者)為線上網站Ecowatch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為《中國的『生態文明』對人類未來意味著什麼？》。這篇文章展現出一種頗具西方特色的視角——它雖然承認中國生態文明觀念的獨特性，卻試圖將中國的這一核心觀念與生態馬克思主義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分離開來。倫特在文章開頭寫道：

想像一下，一位新當選的美國總統在他的就職演說中呼籲建立一個『生態文明』，確保『人與自然的和諧』。再想像他接著說：『我們作為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他的政府將『鼓勵簡單、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對奢侈和過度消費』。你可能會說，做夢去吧。即使在更為進步的西歐國家，也很難找到會這樣表態的政治領導人。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頁878。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習近平總書記 2021 年 10 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了諸多有關生態文明的講話。他詳細闡述了『加大力度建立法律和政策框架……促進綠色、低碳、回圈發展』『推進植樹造林』『加強濕地保護與恢復』以及『採取嚴厲措施制止和懲罰所有破壞環境的活動』的計畫。他富有激情地總結道：『我們今天所做的』是『建設造福子孫後代的生態文明』。他超越了狹隘的邊界，宣告黨的使命是『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既造福中國人民，又促進人類進步』。^[1]

為什麼生態文明這一對中國如此核心的範疇，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帝國核心地區甚至作一個話題都難以想像，完全被排除在其意識形態領域之外呢？倫特認為，這樣的原則與從柏拉圖至今的西方傳統文化截然對立——後者對自然持一種疏離的觀點，將環境僅僅視為需要征服的東西。他認為，這與植根於中國五千年文明中更具生態意識的文化形成鮮明對比——儘管中國自身也經歷了數千年的生態破壞^[2]。他引用了千年前早期新儒家哲學家張載的話：

幹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3]

對倫特來說，儘管中國的生態文明觀值得稱贊，但它與當代中國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並無實質關聯。相反，他將其與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復興』聯繫起來。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採納了生態文明觀念，而這種前瞻性觀點在西方普遍無法理解，這一事實僅僅被解釋為中國和歐洲截然不同的文化遺產。這樣一來，亞洲與西方世界在生態文明方面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物質基礎以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等問題。因此，在倫特的視角下，中國對生態文明的強調與生態馬克思主義毫無關係——除非是負面意義上的。相反，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描述為一個威權國家，是不自由的象征。他指出當代中國『超工業化』經濟在某種程度上比西方更糟，它正沿著污染整個地球的道路走下去，與其聲稱建設生態文明的說法背道而馳^[4]。

倫特的論點似乎是：雖然歐洲和北美擁有優越的政治和經濟基礎，但它們的環境進步受到更具破壞性的傳統生態文化的阻礙。相比之下，中國擁有可追溯數千年的更為和諧的生態文化，但其『超工業化的』威權的政治經濟體制阻礙了這種文化的實現，從而危及整個地球和全人類——除非中國的傳統生態文化能戰勝其當前受馬克思主義啟發的政治經濟目標。

這種以中國傳統價值觀為名，試圖將生態文明觀念與生態馬克思主義以及革命性規模的生態變革問題割裂開來的做法，其最終目的是將生態進步的理念與可持續人類發展的社會主義實踐脫鉤。相反，我認為，生態文明概念實際上是生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歷史產物。任何將兩者分開的嘗試，儘管中國傳統價值觀很重要，都是對生態文明概念歷史意義及其在構想必要的全球生態革命中的重要性的否定。

一、生態馬克思主義與生態文明概念的起源

20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見證了蘇聯生態思想的復興——這種思想曾在 20 世紀 20 年代和 30 年代於

[1] Xi Jinping. (2020).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vol. 3.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 Foster, J. B. (2000). *Marx's Ecolog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3] Jeremy Lent. (2017). *The Patterning Instinct*. New York: Prometheus; Foster, J. B. (2000). *The Return of Natu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4] 參見 <https://www.ecowatch.com/china-ecological-civilization-2532760301.html>.



諸多方面引領世界生態科學的發展,但隨後數十年因政治和社會因素而走向衰落^[1]。然而,隨著其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復興,蘇聯生態學呈現出一種新的獨特征,即將生態問題視為與文明總體問題相關聯的議題^[2]。這一點在 A. D. 烏爾蘇爾(A. D. Ursul)編輯、1983 年出版的重要文集《哲學與文明的生態問題》中尤為明顯^[3]。該卷收錄了蘇聯一些頂尖科學家和哲學家的文章。這直接催生了『生態文明』概念,1983—1984 年間還出現了其他若干相關著作,並且這一概念幾乎同時進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在那裏成為其核心分析範疇之一^[4]。

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生態文明,指向的是對以往一切階級文明(尤其是資本主義)邏輯的超越,因為資本主義對自然和人類實行雙重支配/異化。蘇聯科學院副院長 P. N. 費多謝耶夫(P. N. Fedoseev)在《哲學與文明的生態問題》一書中撰文,指出許多綠色運動應對生態問題的方案隱含著『摒棄文明成果』的問題,這些方案往往催生出脫離歷史的烏托邦,要麼向後看,要麼訴諸技術官僚主義^[5]。著名環境哲學家伊萬·弗羅洛夫(Ivan Frolov)遵循馬克思的路線,強調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是以勞動、生產過程以及科學為仲介的,因此取決於生產方式^[6]。哲學家 V. A. 洛斯(V. A. Los)探討了『文化正日益成為……自然的對立面』這一問題,並指出需要構建一種新的『生態文化』或文明,在更可持續的基礎上重新確立科學技術與環境的關係。他解釋道:『正是在塑造生態文化的過程中,我們不僅能期待對當代文明下人與環境之間存在的尖銳矛盾在理論上加以解決,而且能在實踐中予以應對』^[7]。

從生態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日益凸顯的全球生態危機因而要求進行生態轉型,以創建一種新的生態文明——這一轉型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內部悠久的生態分析傳統,也與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相一致。馬克思和恩格斯廣泛論述了資本主義的生態矛盾,不僅限於他們著名的關於土壤退化與城鄉對立的討論,還包括工業污染、煤炭以及更廣義上的化石燃料的枯竭(用恩格斯的話說是『浪費過去固定的太陽熱』)、森林砍伐、食品摻假、因人為原因導致的病毒傳播等問題^[8]。馬克思著名的『代謝斷裂』理論(他以此應對他所處時代的生態危機)如今已被擴展,用於應對資本主義對生態系統的破壞以及對地球環境幾乎所有方面的破壞^[9]。

在 21 世紀的中國,生態馬克思主義不僅推動了針對當代環境破壞的強力批判的形成,也推動了將生態文明作為應對之策的主張。習近平意識到,生態最終構成了比單純經濟更為深刻的物質根基,因此他在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的理念中強調,生態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0]。他指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人類只有遵循自然規律才能有效防止在開發利用自然上走彎路。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這是無法抗拒的規律』^[11]。這些話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典生態分析緊密相連。他們力陳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在生產中必須遵循自然規律,同時指出了自然對那些無視其規律之人的『報復』^[12]。

[1] Foster, J. B. (2000). *Capit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 Foster, J. B. (2000). Late Soviet Ecology and the Planetary Crisis. *Monthly Review*, 67 (2): 1–20.

[3] A. D. Ursul. (1983). *Philosophy and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of Civilisation*.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4] Ibid.

[5] Ibid.

[6] Ibid.

[7] Ibid.

[8] Foster, J. B. (2000). *Marx's Ecolog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9] Foster, J. B. (2000). *Capit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0] Xi Jinping. (2020).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vol. 3.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1] Ibid.

[12] Cheng Enfu. (2019). *China's Economic Dialectic: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of Refor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當今中國正在推行的生態文明概念，被視為一種新的、革命性的、轉型性的文明模式。根據馬克思主義分析，先前的文明被認為與階級社會相聯系，但同時也在歷史上催生了新的發展階段。在這種觀點下，生態文明是『偉大的現代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與資本主義不同，它不會為了利潤而犧牲人民和地球^[1]。與主流資本主義的可持續發展觀不同，生態文明被理解為包含了政治和文化領域，形成了『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超越了環境、經濟和社會三大要素的標準框架——這一框架已成為自由主義可持續發展觀的特征。如此構想的生態文明旨在實現可持續的人類發展，更加強調福祉的非經濟性內涵，並讓政治發揮主導作用。

正如陳學明在《生態危機與資本邏輯》中指出的，與生態文明相關的社會主義生態現代化的基本原則是『預防、創新、效率、非等價性、去物質化、綠色化、生態化、民主參與、污染收費以及經濟與環境的雙贏』^[2]。建立生態文明的八個優先事項被歸類為：1) 空間規劃與發展；2) 技術創新與結構調整；3) 土地、水和其他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4) 生態環境保護；5) 生態文明制度體系；6) 監測與監督；7) 公眾參與；8) 環境政策/規劃的組織與實施^[3]。

在中國，這種革命性規模的生態改革，甚至是在旨在使中國達到與西方相當水準的快速經濟增長背景下推行的。綜合性的環境保護規劃正被納入所有經濟發展計畫之中。中國對生態文明的重視程度，體現在其明確承認：在實施這些生態計畫的過程中，經濟增長相對於前幾十年將需要有所放緩。這種對環境的關注，可以從中國在以下領域推行的深刻轉型中看出：減少污染、退耕還林與植樹造林、開發替代能源、在敏感河流區域實施限制、鄉村振興、通過集體方式實現糧食自給自足，以及許多其他領域。中國在減少對煤炭依賴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但由於疫情和世界性危機，過去幾年在這方面出現了部分倒退^[4]。盡管如此，中國已為實施生態文明設定了明確的時間節點，包括到 2035 年基本建成生態文明的主要組成部分，到 2050 年建成美麗中國，到 2060 年實現碳中和（淨零碳排放）。

當然，如果僅僅是一個自上而下的計畫，在中國創建生態文明的鬥爭將意義甚微——這樣的計畫幾乎肯定會失去動力，最終屈從於經濟與官僚力量。這一轉型的根本性之所以得到保障，是因為在中國的後革命社會中，生態蛻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同時發生，並依托於以應對城鄉差距為目標的農村重建鬥爭。例如，生活在內蒙古烏審旗沙漠中的農村婦女殷玉珍決定治沙，她投入了一場長達 37 年的鬥爭，她和家人在此期間種植了 50 萬棵樹。她已成為備受尊敬的沙漠綠化專家。該地區的農民也加入了植樹造林的隊伍，近 6700 平方公里的荒沙變成了綠色。前高中教師運建立成功發起了反對水污染的運動。2002 年，她創立了『綠色漢江』環境保護組織，致力於保護漢江免受污染，撰寫了大量環境報告，並與工廠主及管理者進行抗爭。該組織擁有超過 3 萬名志願者。到 2018 年，他們已組織了超過一千次實地考察，沿漢江調查污染源，總行程超過 10 萬公里。目標是動員全社會參與環境保護。來自中國西南部金沙江畔香格裏拉（十五個民族的家園）的王品松，領導動員她的村莊反對虎跳峽的一個水壩建設專案——該專案將導致 10 萬村民流離失所，並淹沒江邊 3.3 萬英畝的肥沃土地。基於民眾自我動員的基層環境行動，在當今中國是一股強大的力量，預示著一種新生態主義的發展^[5]。

[1] 同前頁注[10]，頁 20。

[2] Chen Xueming. (2017). *The Ecological Crisis and the Logic of Capital*. Boston: Brill.

[3] Arthur Hanson. (2019).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alues, Action, and Future Needs*.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4] 參見 <https://www.carbonbrief.org/analysis-what-does-chinas-coal-push-mean-for-its-climate-goals>. 52

[5] Sit, Tsui & Lau, Kin. (2022). Surviving Through Community Building in Catastrophic Times. *Monthly Review*, 74 (3): 54–69.



中國應對環境問題與威脅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其成功應對了前幾年的疫情。中國在保護其人民的同時也保護了其經濟——這是一種雙贏局面——但這一成就被西方廣泛誤解為僅僅是社會上層強加的一系列威權封鎖措施的結果。然而,中國取得成就的秘訣——尤其是在早期階段——在於採用了人民革命戰爭的模式:動員全體人民實現自我動員以抗擊新冠疫情,並重新啟動了群眾路線,將人民與國家、政黨緊密聯繫起來。

二、中國與生態革命

中國面臨著社會內部的巨大生態矛盾,整個全球生產體系同樣如此。就年碳排放量而言,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國。然而,其中很大一部分用於生產供西方消費的制成品,而中國的歷史碳排放總量仍遠低於美國和歐洲——美國人均向大氣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濃度是中國的七倍。就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而言,中國目前不到美國水準的一半^[1]。在《中國能拯救地球嗎?》(2018)一書中,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亞洲高級戰略總監芭芭拉·菲納莫爾(Barbara Finamore)認為,儘管『中國仍是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但它可以說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做得更多,致力於減少全球碳排放——儘管它仍然面臨巨大挑戰』^[2]。毫無疑問,與其他國家的努力相比,中國創建生態文明的鬥爭是革命性的。這主要歸因於它作為一個後革命的、社會主義導向的社會形態——這種社會形態保留了相當程度的經濟計畫能力、國家指導力和集體價值觀,並通過城鄉持續的群眾動員而保持活力。

這讓我們回到倫特在本次演講開頭引用的段落中所暗含提出的那個問題:為什麼一個美國或歐洲的國家元首,就不可能像習近平那樣,提出一個社會當前和未來的目標——這個目標不是僅僅以經濟增長來衡量,而是強調創建生態文明的重要性呢?答案並不僅僅是像倫特試圖讓我們相信的那樣——即中國重振了其傳統生態價值觀,或者西方固守著一種可追溯到數千年前、以『征服自然』為取向的文化。相反,根本的分歧在於一方是一個採納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後革命社會——它吸收了源自經典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批判,並將其視為整個社會主義漫長革命的核心;另一方則是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秩序,其唯一的口號是『積累啊,積累啊!這就是摩西和先知們!』^[3]

像美國這樣的核心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利益——該階級長期以來培育了一種主要惠及社會最頂層的『帝國式生活與生產方式』——是絕不可能突然轉向宣導低碳、『簡單、適度、綠色』的生活方式,或反對中國生態文明觀念所宣導的過度消費與不平等的。^[4]相反,西方應對全球生態威脅的主要激進提議,是由國家資助的『綠色新政』——其通常以市場機制、技術變革和氣候就業為表述框架,旨在使生產在基本不變的前提下繼續運轉。然而,考慮到推行綠色新政所需對抗化石資本的程度,其前景在美國或歐洲幾乎毫無進展——因為即便這樣的提議,也被視為對統治利益的嚴重威脅。結果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當代資本主義中,將地球作為人類棲息地來拯救的任務,幾乎完全留給了私營部門——而後者正是全球生態破壞的歷史根源;與此同時,環境改革的努力已淪為為私營公司創建國家資助的綠色市場,以及自然金融化的新形式。^[5]因此,資本主義的戰爭機器繼續向前推進,在其行進道路上摧毀著人類未來的根本條件。

[1] James Hansen et al. (2017). Young People's Burden: Requirements of Negative CO2 Emissions. *Earth System Dynamics*, 8 (3): 577–616.

[2] Barbara Finamore. (2018). *Will China Save the Planet?* Cambridge: Polity.

[3] Xi Jinping. (2020).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vol. 3.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4] Ulrich Brand & Markus Wissen. (2021). *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Everyday Life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5] Foster, John. (2022). The Defense of Nature: Resisting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Earth. *Monthly Review*, 73 (11): 1–22.

就絕對能力而言，處於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核心的富裕、發達、技術先進的國家本可以輕鬆地引領解決生態問題。它們在政治上無法這樣做，與以下因素有關：資本主義商品社會中社會主義、集體和生態原則的薄弱；規劃實際上是不存在的（軍事領域除外）；以及統治階級對民眾自我動員的恐懼——而要實現我們與環境的經濟關係中的革命性規模轉型，這種自我動員是必需的。為了進行一場以人類生存為目標的生態革命，所需要的不僅僅是環境改革，而是一場更廣泛的、旨在超越資本主義本身邏輯的生態與社會革命。

三、革命性生態社會主義與未來

到目前為止，我一直強調革命生態社會主義或生態馬克思主義在生態文明構想中的重要性。並非偶然的是，生態文明概念於 20 世紀 80 年代首次出現在蘇聯，如今正作為指導原則和核心專案在中國得以實施，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卻鮮有討論。這不能僅僅歸因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儘管它起到了一定作用。將這一點與後現代文化概念聯繫起來也說不過去，因為後現代文化在這方面並無真正的物質基礎層面的關聯。相反，任何有意義的生態文明概念，都离不开一个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强烈反对将资本积累奉为人类进步的最高衡量标准。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生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是按照其自身的『本土革命傳統』發展的，新的批判性概念被視為直接面向問題並立即付諸實踐^[1]。這不同於它在西方的概念化——在西方，生態社會主義研究者與實踐的距離更遠，通常致力於更廣泛、往往也更抽象的理論發展。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區）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一個主要關注點，是重建馬克思的代謝斷裂理論，以及如何在這方面加強對資本的持續批判。因此，將這種源自中國建設生態文明實踐的復興的生態批判引入進來，應該成為一個優先事項——事實上，中國的許多學者目前正在從事於此。

就我們在最近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更新和闡述中所了解到的而言，一些概念至關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馬克思的三元概念：『自然界普遍的物質變換』『社會物質交換』，以及『社會物質交換相互聯繫過程中的無法彌補的裂縫』——即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代謝斷裂^[2]。『自然的普遍代謝』這一概念確認，人類和人類社會是自然的組成部分，是自然演化的產物。『社會代謝』表達了人類如何通過生產與自然互動並改造自然。而『代謝斷裂』則反映了一個事實：一種異化的社會代謝——以對自然的剝奪作為剝削人類和積累資本的手段——必然會產生生態危機，從而在異化的社會代謝與我們所身處的普遍自然代謝之間制造裂痕。

馬克思本人為我們現在所稱的可持續人類發展提供了一個精辟的定義。他認為，沒有人——即使是世界上所有人或所有國家——擁有地球；相反，我們有義務以用益權的方式持有它，作為地球家園的好管家，為人類代際延續而維系它^[3]。要在這方面取得真正的進展，克服與剝奪和剝削過程相關的自然與人的異化，就必須將變革的主要力量從單純的經濟無產階級（和經濟意義上的農民）擴展——在一種更具包容性的唯物主義框架中——為環境無產階級（和生態農民）。事實上，我們最初討論的三個範疇——生態文明、生態革命和生態馬克思主義——若沒有這第四個術語即『環境無產階級』，幾乎毫無意義。

我們與地球的關係是我們最基本的物質關係，我們的生產、歷史和社會關係都由此生成。那些在與自然和地球的關係中為資本主義體系所最大程度異化、剝削和貶抑的人，構成了 21 世紀變革的力量和途徑。

[1] Teodor Shanin. (1983). *Marxism and the Vernacular Revolutionary Traditions in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ed. Teodor Shani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 Foster, John. (2013). Marx and the Rift in the Universal Metabolism of Nature. *Monthly Review*, 65 (7): 1-19.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頁 878。



在馬克思所稱的『人的需要層級』中,我們與地球的關係必然居於首位,因為它構成了生存以及生命本身發展的基礎^[1]。

(Editors: ZOU Ling & JIANG Qing)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頁209。